

赛博空间中的伦理想象：一种认识论还原

贾丹丹 宋德伟

摘要：“赛博空间”作为后人类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存在于科学技术和现实生活张力中的文本世界。在这个文本世界中，以生物性为基础构建的新社会现实扩大了生命体的存在范围，以非对应性、非伦理性展示出新的社会关系构建的可能性，以符号性简化并突出了人与赛博格之间的信息交流模式。赛博空间作为一种诗性想象，不仅是一种对“人-机”新生命体的审美化展示，还是一种对未来社会伦理构成机制的反思。

关键词：后人类文学；赛博空间；认识论；伦理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4)03-0154-07

“赛博空间”(cyberspace)作为后人类文学(post-human literature)这一类作品的重要特征，是一种由科学技术和现实生活深度融合的文本世界。美国文学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指出：“召唤想象世界是所有艺术作品的核心，这个想象世界可以与现实或历史环境高度相似，也可与之大相径庭。”^[1]布伊尔的表述实际上也为赛博空间研究指出了两个维度：一是与现实或历史环境高度相似的“后-”人类研究。后人类文学对赛博空间的描写成为美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说的那种“特性角色”(characters)，是一种“文化的道德表征”^[2]。二是与现实或历史环境大相径庭的文学性研究。赛博空间在后人类文学中实际上就表现为一种以技术为基础展开的诗性想象，这是作家将人的内在经验形式化，并通过这种形式将经验客观地呈现出来，进而揭示出这种技术性空间作为人类生存背景的伦理意义。

当前，学界对于后人类文学赛博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叙事、空间等视角，鲜有对其进行伦

理维度的思考。作为对现代技术伦理困境的反思和对未来社会人性的展望，后人类文学所描绘出来的技术性的伦理世界，是一种拥有道德特征的文本世界。因此，对赛博空间进行一种本体论审视，可以发现，生物性是赛博格这种典型的“人-机”生命体的基本属性，是深入理解这种可能世界的重要进路。以伦理性来对照、反思赛博空间的非伦理性，可以以人与社会的关系为蓝本，对以技术为主导的未来世界进行后人文推演，发现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认识论危机问题。对赛博空间的符号属性进行研究，可以揭示从复杂的人际关系向简约的符号关系还原的过程，能够从方法论角度重新认识赛博空间作为一种可能世界的意义生成模式，揭示后人类文学这一类文学文本的美学价值。

因此，本文以威廉·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等多位后人类文学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从生物性、非伦理性、符号性三个方面，对赛博空间的属性进行认识论还原，彰显其伦理意义的生成机制。

收稿日期：2023-11-10

基金项目：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共情伦理的认识论研究”(CXJJ-2023-366)。

作者简介：贾丹丹，女，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讲师(上海 200434)。宋德伟，女，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河南郑州 450001)。

一、赛博空间的生物性

生物性是赛博空间比较鲜明的属性之一,同时也是后人类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的重要诗学想象特征之一。因为赛博空间里的各种人物都是以一种“生物+”的形式出现的,“人-机”复合体的双重性决定了赛博格(cyborg)作为新人类在可能世界的存在悖论。

1. 信息交流方式的技术性没有真正改变人的认知方式

熟悉后人类文学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赛博格的存在形态是以新技术来拓展人身体原有的生物性基础,人们不再依赖于原有的社会交流模式,而是借助于各种新的存在方式,即以一种去身化的方式来完成原有的社会交流。例如,在《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作家吉布森把赛博空间视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合法操作者所经历的一种虚拟生活。故事里的主人公凯斯(Case)通过远程的具身化,以合成后的“人-机”有机体来拓展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身体。一旦他因神经系统被破坏而无法进入网络空间时,就会显得十分失落,恰如小说所描写的:“对于在赛博空间里享受过超越肉体极乐的凯斯来说,这就是跌落(fall)。在他曾经经常光顾的牛仔酒吧里,精英们对于身体(flesh)多少有些鄙视,称之为‘肉’(meat)。现在,凯斯已掉进自身身体的囚笼中了。”^[3]作家吉布森借凯斯之口将“身体”比作“囚笼”,这是因为在网络空间中,人已经被建构成虚拟的数据存在,人的物理性存在转换为数据性的存在,身体就必然成为一种束缚。从这个角度看,作为整个新社会形态的缩影,赛博空间允许人类(如凯斯)超越物理空间进入一种技术性的想象空间,成为一种去身化的新人类。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作为一种生命体,从“去”肉身到“再具”新物理存在,赛博格实现了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突破。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原来的生活和交流方式,让整个社会网络化、信息化了,这也是“赛博空间”这个词的来由,即“控制论”(cybernetics)和“空间”(space)两个词语的结合。

但是,赛博空间中的新人类(赛博格)仍然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新技术并没有让他们超越原有的认识模式。尽管赛博格之间的交流失去了人的身体的在场,但生物性的现实交流依然存在,心灵仍然囿于原有的交流欲望之中。在赛博空间中,技术作为

一种拓展人类身体的工具被透明化处理了,是一个已知项,使用者沉浸在自己所创造的技术性现实中,充分显现所有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完全依赖于人类原有的认识模式。从肉体 and 心灵二元对立(“我思故我在”)的传统认识论来看,后人类文学直接否定了这种认知模式的存在意义,倡导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即“旧我”已不在,但仍可以“思”;人们不再依赖于原有的社会交流模式,而是借助于各种新的存在方式,即以一种去身化的方式来完成原有的社会性交流。简而言之,赛博格及其空间的构建,仅仅是从技术的角度拓展了人类生存现实的可能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认知方式。

2. 信息交流方式的技术性不能改变人的生物属性

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强调信息技术革命对于社会的构建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的新形态^[4]。对于后人类文学来说,赛博空间就是这样一种类比性的存在,它作为虚构出来的新形态现实,是对未来人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展望。海勒斯在其奠基性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指出:“后人类的观点是信息模式优先于物质实例化。因此,生物基质中的具身被视为历史的偶然,而不是生命的必然。”^[5]信息似乎能够在不同的物质中自由地流动,而不改变其文化特征。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Jeanne Haraway)也认为:“20世纪晚期的机器完全模糊了自然和人造、心智和身体、自我发展和外部设计以及其他许多适用于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区别。”^[6]从这个角度看,海勒斯与哈拉维已经把生物性现实看作后人类时代的信息模式建立的基础,人、赛博格等各种生命体尽管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他们却有着同性同构的认知模式。我们可以下面两部作品为例,来分析这种类比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在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中,赛博格不再是“无机”的物件,而是有了新的形态与功能的仿生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与人的关系不再是冰冷的嫁接,而是有机的深度交融。在计算机的辅助下,人类能够将大脑中的意识传输到电脑中,电脑中的信号也可以输入人脑中,人-机的交互使得人们的期盼能够实现。在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Snow Crash*)中,女主角Y.T.拥有高级的技术化设备,她的智能滑轮上面的一只只智能轮上有非常

多的辐条,可以随着地面形状的起伏伸缩变化,带她轻巧地穿越草坪。她的制服“有上百个口袋……这些五花八门的口袋里通常都装着些小巧轻便的物件:钢笔、记号笔、笔形手电、袖珍折刀、开锁器、条码扫描器、闪光信号灯、螺丝刀、防身喷液、防身电击棒和夜光棒”^[7]。除了这些方便工作的现代技术产品外,信使 Y.T.还配有可以保护个人贞操的现代智能设备——“守宫阴牙”。这是赋予她女性存在的一个技术符号,但是,它也因此阻碍了她与恋人进一步深入融合。

在这两部后人类文学作品中,赛博格作为新人类是以“生物+”的形式存在的,其身体是与技术融合生成的新型主体。迪克的小说以诗性想象展示了这种生物性交流的可能性,但是斯蒂芬森的小说明显否认了它的生物性价值。显然,赛博空间仍然只是一种文学想象,人的去身化行为是仿生学技术的产物,后人类文学作家们把它变成一种超越物理空间的审美行为,期望能替代原来的世俗社会纽带。但是,这种现代审美仍然是一种基于功能形式的神话,生物属性仍然是这种诗性想象的根基。赛博空间消除了技术的硬件,降低了它的形式存在感,但技术并不会消失,而是发生了一种改变,即信息或者数据的介入。这样,现实被电子化、形式化、审美化了,一切都可以被抽象或者减少至一个微小元素或信息元件。人与其他生命体一样,都变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新存在。或者说,赛博格所标示的只是一种“人”的观念的重要转变,它使人从一种先在的、超验的、元话语叙事的位置上跌落下来,与“非人”元素,如动物、生态、自然、地理或世界上的其他存在形态进行互动交流,并共同进入人的思想与知识的视野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赛博格社会作为一种时空存在者,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和话语表达,即一种生物现实下的新世界。

二、赛博空间的非伦理性

研究赛博空间的非伦理属性,仍然是基于人类中心认识论展开的一种讨论。因为赛博空间作为一种可能世界,承载的只是一种无生命的、无机的、非个性化的机器人,这种文本世界中人为制造出来的社会复杂性只是技术层面上的,而不是伦理意义上的。换言之,假若我们在现实中把自然从复杂的有机物还原为无机物,将整体性还原为单一化,这必然导致生物学意义上的某种退化。而后人类文学作品

中赛博格的存在更多是物性的,而不是独特的、富有个体意义的精神性存在,赛博空间的存在也会进而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有机性。因此,后人类文学对于赛博空间在认识论意义上的设定,反思了技术之于伦理生态位(the ecological niche)构建的现实价值。

1. 技术与伦理的非对位性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早就指出:“学习一种技艺就是学习使一种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技艺的有效原因在于制作者而不是被制作物。”^[7]这里所说的技艺的伦理价值表现为一种制作者的伦理原则,后人类文学作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技艺之一,就是通过揭示文本世界中的伦理关系,来反思技术之于社会的伦理问题。

例如,格鲁格·贝尔(Greg Bear)的《血音乐》(*Blood Music*)中,生物学家弗吉尔·乌兰(Vergil Ulam)创造了一种生物芯片,但公司却要求他摧毁这种生物芯片。他无视公司的规定,通过把芯片注入自己体内的方式躲避了检查,把芯片携带出去,在其他地方继续研究。不幸的是,这种生物芯片作为一种“意识细胞”(noocytes)可以与人类的细胞相结合,它们迅速繁殖、进化,直至改变人体基质,并具有自我意识。后来,乌兰被感染,整个社会也都被感染,进而形成另一种新型的社会,即不需要身体基质只需要思维的新世界。

在这个故事里,生物芯片作为新技术的存在,影响了人类的存在。被芯片感染的人的身体缺陷可以被修复甚至增加,这种生物细胞像病毒一样在人类社会肆意蔓延,直至整个原有社会形态的毁灭。小说中的主人公对于技术的理解是一种单向度的认知,或者说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因为主人公对生物芯片的痴迷使其丧失了基本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弗吉尔·乌兰的技术伦理观作为一种非伦理现象,是对我们当下社会过分重视技术的反思。实际上,我们根本无法区分技术是否都受制于它的社会价值,或者反过来说,我们无法真正把技术吸纳进我们的社会共同体。技术与社会之间出现的裂缝,必然导致伦理与技术的非对应性存在。技术与社会共同体的分离,意味着技术被作为一种对立面的形式出现,这时其伦理内涵也必然被排除在外,成为窄式认识论意义上的技术工具。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伦理将从物质实体中剥离出来,技术就会失去社会共同体的控制,变成个人利益竞相追逐的产品,进而失

去生态身份、生态意义。

反相位观之,《血音乐》中人类自身存在的本体论危机来自对生物逻辑的反思,新的生物体不断地与人类产生冲突,直至人类灭亡。这同样是一种政治性的、非伦理性的行为。弗吉尔·乌兰对生物芯片的占有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因为在故事的结尾,整个社会陷入一场灾难。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乌兰没有意识到,具体的技术性劳动面对的只是具体的细胞物质,这种劳动只能是参与塑造一个存在于或者潜藏于自然现象中的现实。但事实上,他的技术性行为并不是一种基于伦理层面的思考,他没有权利去改变生命世界的多样性,更不能因为个人私欲去减少这种多样性。多样生命的存在既是对个体的尊重,也是对生态的尊重;既是对生物伦理的尊重,也是对生态伦理的尊重。在生态层面,人类干涉其他生物的本体论存在就是一种政治性行为的开始,是干扰、去除生命体之间“对位性”关系的行为。但是,人类却把自身的这种政治性行为视为技术的发展或者自身文化的延续,经常把自己对其他生命体的尊重视为一种伦理关怀,这无形中就构成一种悖论,其实这也是一种认识论错误。

2. 赛博空间的非伦理性

赛博空间作为一个虚幻出来的生活世界,是后人类文学家对未来人类世界的思考。从一般意义上讲,普通的人作为一种存在,是自然根据内在法则创造出来的。当然,它也可以是神学意义上的上帝造出来的,还可以是根据康德意义上的理性法则生成的。而赛博格显然是普通的人根据生物法则展开的想象,是在一种破碎的具身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笛卡尔工程”。因此,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它,而只能用心灵的眼、用盲人的方式去看。我们并不是真正看到,而是用我们的大脑把各种行为置于一种象征性的意识形态之下,而不是将其置于非伦理秩序中。

在《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是一个生物学家,专注于生命的创造。他试图征服死亡,创造一种新的生命。他从藏尸间偷来死尸的不同部位组装出一具身形高大的类人形的怪物,但是,当这个怪物真正醒来时,弗兰肯斯坦自己却被它的狰狞面目吓跑了。这个人类创造出来的怪物遇到了许多痛苦不堪的问题。怪物由于形象恐怖,无人敢接近它。怪物缺吃少喝、孤独寂寞,最终死亡。

这个故事里的怪物,其实也就是后来诸多作品

中的赛博格,尽管它们在外形上不同,但在创作理念上,都刻意模糊了技术科学世界中人类与非人类他者之间的本体论界限,强调物种间的平等、情感与联结,并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的关系系统。但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随着技术对身体的嵌入,人类的身体和外在世界之间的界限不再是固定的,甚至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也可能是流动的,身体与技术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以生物现实为基础展开的相互融合。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还原,既是为了探索生态方面构成的可能性,也是为了在时间意义上突出存在者生态演化的可能性。赛博空间中的伦理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赛博格们是作为“怪物”而不是作为“人”的概念出现的,它在自然世界里并没有所指对象。即使对于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来说,可以把赛博格作为“人”的概念,但这个存在者仍然只有一个物性存在,并不具备意义空间,其存在意义仍然值得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人类文学的赛博空间中,身体作为一种具身体现经验,是行为的身体性过程,可以促使行动真实地发生。在赛博空间的虚拟现实,我们的身体可以和任意空间联系,而不必局限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于胡塞尔式“生活世界”的抛弃。如果说赛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让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也可以说,我们人类正在失去自己作为物理存在的基础。现代社会的技术俨然是一种象征文化,尽管它并不像仪式那样让人类拥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但是,在虚拟世界里,它同样成了各种人物面对技术时无法脱身而去的重要原因。它的存在意义类似于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无意识的象征,可以改变人对世界的看法。然而,技术并不是一种我们必须肯定或否定的价值,而是对于世界进化、多元化的一种伦理挑战。后人类文学中关于技术的生态想象,构成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挑战了传统的社会模式,在社会文化领域中甚至可以召唤大众遵循其统治思想和行为模式。

由此可见,赛博空间中的技术问题在文学作品中被视为一种非社会性的存在,并且往往被以一种基因学的、心理学的、个人化的主观事件加以描述,这使得技术问题远离了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意义。这种认知方法不仅回避了技术生态身份问题中的社会机制,而且阻碍了人们对其社会实践意义进行反思的可能性。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病理学(*pathology*),使心灵与物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

反馈受阻。

三、赛博空间的符号性

符号性是后人类文学创作理念中的本然属性,因为无论是赛博格还是赛博空间,它们都是对未来世界可能性的诗性想象。它们并非技术所期待达到的某种身体/身份,更像是大众在物欲基础上生成的、目前尚不可能存在的科技符号。

1. 作为一种符号域的赛博空间

在赛博空间中,虚构现实替代了传统认识论中的时间、空间概念,地理空间的去物质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逐渐“去身化”等,让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如同信息论和控制论将人类视为一套信息处理系统一样。系统的边界就是信息流动的边界,也是后人类之“后”字的含义所指,毫无边界的空间感事实上就是人的意识的一种隐喻。因此,赛博空间不是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社会现实,而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一种信息模式下受彼此消费欲望驱使的交流平台。

在赛博空间这个信息平台上,赛博格作为一种符号,它不再简单地是某种物的本性展示,而是人与赛博格、赛博格与赛博格之间的关系编码,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是社会文化的意义结构。尽管身体在某种程度上缺席了,但它又通过信息的符号化表征在场。符号化的赛博格并非完全脱离语境,而是被镌刻上大量的文化及关系结构。

例如,科幻校园轻喜剧《机器少女法兰姬》(*I Am Frankie*)中,女科学家西格妮(Sigourney)研制出了一台高智能少女机器人,因为她不愿意把这个“美少女”机器人卖给军方当武器使用,于是将其带回自己的家,取名“法兰姬”,让“她”像其他正常年轻人一样去生活、学习,而这个智能机器人也不得不充分利用自己的高智能设备来适应社会中的各种状况。

在这个故事里,“法兰姬”显然是以赛博格的形式出现的。作为一种信息化实体,“她”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可以根据所遇到的不同生命体/人,随时调整信息编码,完成彼此之间的交流。但是,在这些信息交流过程中,各种交流的完成是符号化的,是一种编码-解码的过程,而不是原始生物学意义上的交流。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法兰姬”在具有人类一切生物特征的基础上,被加载了更多的符号功能。尽管是基于不同的

存在介质,但从本质上讲,“她”具有了类似的主体性特征,而且这种主体性只有在交互中才能够被真正定义和实现。简言之,人类的主体性从一种确定的人类中心转向一种在流动与互动中存在的交互性,“法兰姬”所代表的“新人类”作为一种认识论主体,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间性”的主体,它解构了人类存在的固定化的核心意义,将其重置于流动语境的有效互动之中,即将其置于一种符号域的构建过程中。

从符号学角度看,无论是故事中的“人”还是“法兰姬”,他们都是符号的执行主体,他们的存在也都是符号使用者,因而他们也都是本体论主体,是现象世界的主体。从更广义的角度看,人与赛博格、赛博格与赛博格之间是彼此的符号,它们生存的赛博空间作为一种文本世界,是以符号域的形式出现的,因而赛博格和赛博空间之间也是一种符号关系。正如生态符号学家图尔·乌克斯库尔(Thure von Uexküll)所指出的:“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包括细胞,都像主体一样行事,只对符号产生反应,只要它们活着就是如此,对因果冲动没有反应。”^[8]

后人类文学中主导这个符号域运作机制的是信息编码,无所不在的信息技术诱导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认为能够从信息的维度看待一切事物,并且最终把信息作为这个世界的建构基础来分析。换言之,信息概念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技术不仅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对世界的感知和评价,而且影响人们对世界做出某种反应,从而将人类的交往模式转换为一种信息模式。符号关系从居间功能、物与物的差异中抽离出来,转而进入多次意义创造,进入符号自我指涉关联的开放式系统。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自动化主义”(automatism)的展示,物向符号的转向实际上就是让一个物体进入自动化的符号域,进而变成类似于鲍德里亚所说的“一种功能上的封闭性和意义重复”^[9]。这时,居间符号-物进入能指范畴,居间功能物变成符号所指,因此,当功能关系脱离与人的绑定时,就会被替换成为符号-物的任意性关联。或者说,后人类文学中的赛博空间让读者预先看到后现代符号价值统治的世界,符号-物的数量会极限增长到某个临界点,促使幻象与现实、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别趋于消解,符号自我指涉的游戏成为独立存在的新现实。

2. 作为一种物性符号的赛博格

这里的“物性”是针对“物”与“符号”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来谈的。鲍德里亚认为:“符号-物既不是

给定的,也不是交换得来的:它是被个体主体将其作为一种符号,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符码化的差异来占有、保留与操控的。”^{[10]46}“物成为符号,从而就不再从两个人的具体关系中显现它的意义。它的意义来自与其它符号的差异性关系之中。……由此,只有当物自发地成为差异性的符号,并由此使其体系化,我们才能够谈论消费,以及消费的物。”^{[10]47}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大众文化的运行方式就是如此,将符号变成物,使物成为符号的复制品。同样,人与物之间的功能关系逐渐让位于人与符号之间的消费关系。人与符号之间的消费关系不再受制于人与物之间的功能耗费关系的制约,而是取决于符号之间、物与物之间的差异化互动逻辑。

对于后人类文学来说,赛博格作为一个符号,在赛博空间里是以其物性而存在的。但是,赛博格作为符号不是因为先有一个物在那里,而是因为我们用人的意象或者解释的观念去照亮它,使之出现。诚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言:“倘有人认为,我们只有具备了科学理论——具备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历史学的基本概念和原则后,才能从事对知识的批判的话,那么可以说,我们用以实现自己之目的的手段未免太高了。”^[11]赛博格无论作为赛博空间的物,还是作为现实世界的符号,二者之间的意义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作为符号,赛博格是被我们的知识所定义的。但实际上,将赛博格作为纯粹的非符号、非意义的物,又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存在。任何人类直接谈论赛博格,都是对其进行解释的结果,或者说是符号化的结果。由此,物也是符号化的东西,是在意识的定义中被解释的一种意象。这样,物就成了一个名为“物”的符号。一旦我们把对象物作为一种解释者“看”的结果,符号就是被反向建构的。事实上,赛博空间作为后人类时代对于社会的一种认知模式,是后人类社会对于主体的一种新认识,因为“人”或者“机”都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失去了自身的存在即物质这种根本特质。

从哲学认识论来看,赛博格作为赛博空间中的存在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超越主体性原则的,也可以认为是主体间性的,彼此的单一性特征是相互依赖且不可规约的,如客体的大小和形状。如果赛博格之间没有关系存在,那么他们彼此就不可能有客观性的存在。或者说,“关系论”是一个中性词,它不只是为客体存在提供前提,这里的前提或者是本体论的,或者是认识论的,但它与物体之间的区别是

不容忽视的。简言之,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存在模式之一。

作为一种新人类形象,赛博格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通过审视赛博格,可以列举出一些始于物质、独立于意识的客体及其环境,后者也可以被不断认识并被世界所接受。偶然出现的客体缺失独立性,与物质性客体相比,它与人的意识关系不大,它只是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印证物质存在的意义。但是,很显然,赛博格作为“人”(存在者)这个概念,并不是这个词语所特有的任意性,而是它超越了所有的局限性,把读者对于“人”的形象的阅读置于一个特定的前提下进行,即一种信息革命下的特定的“人”的形象。这个概念的产生必然是符号化的,或者说,这个符号的生成有一定的历史因素。尤其是文化符号,它始于自然,成于社会,却并没有与自然分裂,而是拓展其自然特性进入新的领域。因此,符号此刻变成了人类中心论的符号,为其意义的多样化打开了空间,或者说,符号的意义得到进一步的演化。

从这个角度看,赛博格作为一种物性的存在,部分因素在某个时期是被客观化的,是在进入“人”(特种生物)的周围世界后被心理化的,然后形成一种自我身份识别。在从生物性存在发展到社会性存在的过程中,赛博格的“人-机”客观世界被社会所建构了。但是,作为读者,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符号化过程,因为符号的任意性是对符号意义的有意忽略,毕竟符号在自然中本身就拥有关系意义。实在是经由人的感知展示出来的,后者又与说话人/听话人言说的内容有指示性的联系。这里的言说内容,是一种内在符号化的过程,是周围世界在符号的交互过程中变成内在感知。恰如昆虫需要食物,猴子需要树枝一样,人类的感知必定同样反映实在,而且愿意将其视为一种符号,并乐意构建一系列的赛博格符号来控制整个实在界。因此,赛博空间中同样蕴含了一种人类中心论,其符号维度也暗含了符号伦理,展示了主体及其周围世界之间的各种可能关系。正如有评论者所认为的:“哈拉维提出赛博格形象的目的,并非要分析人类和机器是如何合成创造出‘后/超人类’(post/trans-human)的,而是试图把它作为一个隐喻,来说明人道主义的二元对立是如何且不得被推翻,以此来克服一种共识。由于人道主义不合理的特权,这使得实际的压制模式永久化了。”^[12]换言之,哈拉维提出赛博格概念的目的,并不是指称一种现实,而是

描绘一个正在被构建的新主体和新的可能世界的生成。

结 语

后人类文学并不是为了打造一个新奇的世界,而是为了推演和模拟,旨在为未来的人类社会构建一个可能世界,即赛博空间。在这个赛博空间里,各个生命体之间仍然是以生物性为基础构建的社会现实,是对未来社会的展望。但是,赛博格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性的、非伦理性的存在,这就为未来的生态危机敲响了警钟。从另一个角度看,赛博空间的设定完全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符号性的,赛博格及其生活的赛博空间是为了展示另一种伦理构建的可能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人-机”结合体构建的赛博空间中,“人”是以一种充满悖论的、缺席的形式来再现的。人与赛博格之间、赛博格与赛博格之间,都是信息化的、符号化的。“人”与“机”处于两个不同范畴之中,相同和差异被并置于另一个范畴内。这是一种生物性现实的“再现论”,它必然导致文本意义生成的非现实化。从技术向现实的还原过程中,也会缺少直接性,或者说,从本体论对赛博空间进行认识论还原,实际上仍然主要指的是构成和属性方面的还原。因此,从生态批评视角审视后人类文学需要非常慎重,尽量避免那种从生态学

向生物学的还原、从生物学向生理结构的还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这一类文学文本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弱化乃至忽视。

参考文献

- [1] 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4.
- [2]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35.
- [3] WILLIAM F G. Neuromancer [M]. E-book ed. The Ace Publishing Group,2003:8.
- [4]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69.
- [5] KATHERINE H.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2.
- [6] 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M].陈静,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321.
- [7] 斯蒂芬森.雪崩[M].郭泽,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50.
- [8] THUREVON U. Introduction: The sign theory of Jakob von Uexküll [J]. Semiotica, 1992 (4):279-315.
- [9]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71.
- [10]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M].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11] 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M].沈晖,海平,叶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7-48.
- [12] GAVIN R.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Donna Haraway's cyborg imagery: Descartes and Heidegger through Latour, Derrida, and Agamben[J]. Human Studies, 2014 (4): 505-528.

The Ethical Imagination in the Cyberspace: An Epistemic Reduction

Jia Dandan Song Dewei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features of post-human literature, “cyberspace” is the textual world created within the tens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ealistic life. In this textual world, the new society reality based on biological properties expands the existing sphere of the life forms, whereas its uncontrapuntal and unethical features buttress the possibilities of constructing a new social relation. Moreover, its semiotic traits simplify, yet forge the modes of the human-cyborg communication. Cyberspace, as a poetic imagination, is not only the aesthetic exhibition of a new kind of the “man-machine” life-form, but also a reflection on the ethical mechanism of the future society.

Key words: post-human literature; cyberspace; epistemology; ethics

责任编辑:采薇